

〔古代帝王文化丛书〕

李福泉 主编

# 古代帝王文祸要论

陈开科 著

岳麓书社

主 编 李福泉  
责任编辑 杨云辉  
封面设计 胡 颖

D10220

·古代帝王文化丛书·

**古代帝王文祸要论**

陈开科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70,000 印张：7.125 印数：1—3,000

ISBN 7-80520-727-5

K·142 定价：8.00元

**湘新登字 007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编：422001

古代帝王文化丛书

李福泉

主编

岳麓书社

98  
K220.5  
9  
>

## 《古代帝王文化丛书》序

帝王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构架的支柱，帝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衰衍变，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古代帝王文化丛书》以帝王文化为视角，全面系统地勾勒出历代帝王文化生活的内涵、历史演变及社会价值，揭示中国古代帝王社会的文化品格，以丰富我国古代文化研究的内容，推动文化史研究向着更高的社会层次深入。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平民文化与统治文化两个层面，呈现出基础与提高的两个发展序次。平民文化本身也在不断提高，但社会权力却赋予统治者以垄断文化的特权，因而统治文化具有更多的提高的条件，如同儒家学说在古代中国思

想中占有统治地位一样，统治文化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也占有主要地位。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社会科学、生活习俗、文化娱乐，乃至科学技术的发展，无不在统治文化的影响下发展、变化。高居于统治权力顶峰的帝王在握有天下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强有力地介入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并享受着社会提供的最赏心悦目的文化乳汁。正因为帝王文化处于统治文化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强烈地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帝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具有双面影响。其正面影响，一在于帝王文化内涵着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宫廷建筑、音乐歌舞、杂耍艺术、帝王文学、统治思想和谋略中精品屡见，具有永恒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二在于帝王文化以其特有的地位深刻地影响乃至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优秀的帝王诗词丰富了中国的古典文学，帝王巡游中发生过影响重大的军政大事，更有权术谋略支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等等，帝王文化因此而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帝王文化以其正面影响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使其精彩纷呈。帝王文化的负面影响主要在其垄断性和腐朽性。专制独裁的文化氛围始终制约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专制帝王对文化人实行文化专制，箝制思想，制造文祸，规设禁书，将大量文化娱乐禁闭于宫廷，从而达到垄断文化的目的。帝王们还利用握有的权势，随心所欲，在文化享受上寻求刺激，淫声、

秽色和绯闻弥漫于帝王文化的殿堂。帝王文化的垄断性和腐朽性，给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是其中的糟粕。

沉舟测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帝王文化伴着帝王制度的失落而成为历史遗存，新世纪的曙光降临在中华大地。随着物质文化的日益丰富，人们越发感觉到精神文化的珍贵。了解和研究帝王文化，有助于人们清理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对帝王文化的批判过程中，吸取其进步性的精华，剔除其腐朽性的糟粕，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通过历代方方面面帝王文化生活的观察，正确认识我国封建社会的本质，更加珍惜我们的今天和未来。

本丛书以正史和实录为依据，广撷历代野史、文集、笔记、诗赋、逸闻和考古资料，内容涉及帝王历史、权位角逐、谋略权术、文祸要论、家族悲欢、后宫世界、生活起居、宫廷娱乐、咏世诗文、巡游记实、陵寝规制等等。这里有诸多帝王文化制度的源流演变，有历朝历代皇室的风云变故，有鲜为人知的帝王宫闱趣闻，有堪称珍贵的帝王诗文词赋，还有多姿多彩的帝王生活知识的描绘。读者将从这一套融知识性、学术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文化丛书里获得神秘的帝王知识，窥视宫廷文化的基本面貌，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奥妙，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由于中国古代历史悠久，帝王众多，朝代更替，疑窦丛生；文化概念模糊，内涵广阔；帝王文化资料浩瀚芜杂；

著者学识浅陋，时间匆促等等，本丛书在编目的安排、制度的考释、史料的选择和理解等方面必有疏漏和错误，如蒙专家和读者指正，则幸甚。

李福泉

一九九六年冬于岳麓山畔

## 前 言

“尊贤使能”是我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治国良方。古代的许多政论家都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如墨子就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墨子·尚贤》）晏子也说：“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则其道也。”（《晏子春秋·内问篇上第十三》）西汉的贾谊更是明白地说：“得贤者昌，失贤者危亡。”（《新书·胎教》）把“尊贤使能”和国家安宁、天下存亡联系在一块。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正好给这种“尚贤使能”论作了最清白的注脚。商汤用伊尹而灭夏；武王用姜尚而兴周；“齐桓公得管仲，有霸诸侯之荣。”（《新序·杂事》）魏文侯用李悝而强国。后来，刘邦重用“三杰”、刘秀“侧席幽人”、曹操三下“求贤令”、刘备“三顾茅庐”、李世民善待“天下文儒”“给以五品珍膳”（《贞观政要》）而有“贞观之治”。就连对知识分子怀着刻骨仇恨的明太祖朱元璋，也曾“礼致耆儒”，终得建立明朝。反之，仇视、迫害贤能，则坐致灭国，身死而天下笑。象夏桀囚死关龙逢而丧国；商纣虐杀比干而亡邦；楚怀王流放屈原而失郢；项羽不用范增，只好仰天长叹，落个乌江自刎的下场，等等。历史和逻辑在此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在中国这样一个家国同构的人治社会里，尚贤使能已成了传统政治的一个永恒命题。

那么，在古人眼里，何为“贤能”呢？东汉的刘向说：“一者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人物志·接识》）这是说，论



贤能，必从“道德”、“法制”、“策术”三个方面来论断。而这三个东西，不会自天而降，必待学习而后知。因此，荀子就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荀子·大略》）由此可知，贤能，必定是读书人，也即是古代的“士”。“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资治通鉴》卷三十一）读书人对历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历代帝王，十分重视研究如何对待读书人的问题。出发点不同，环境不同，结论就不同。表现于政策，也就有不同的效果和影响。而知识分子的命运也由此而悲欢离合、变幻莫测。

从历史上看，除了极少数帝王能“以史为鉴”，对读书人笑脸相迎，真诚相待外，绝大多数帝王出于种种原因，都对读书人没有什么好感，一般都毫不犹豫的采取高压政策。有时冲冠一怒，干脆狠下心，大开杀戒。这其中，还有极少数帝王，不仅对读书人无一丝好感，甚至对读书这件事也视如寇仇，几至虐待狂的地步。象秦始皇，既焚书又坑儒，便是典型代表。帝王们随心所欲地敌视、迫害、残杀读书人，造成“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的文化悲剧。一般来说，历史上把这种帝王对读书人的残害，统而称之为“文祸”。统治者是怎么制造文祸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古代文祸的深度和广度如何？文祸对中国文化史有些什么影响？等等。这都是《古代帝王与文祸要论》一书所要回答的问题。为了把“文祸”这一文化史上很复杂的问题弄清楚，作者采取了系统分析的方法，从政治、作品、言语、科场及文化思想等五个方面，全方位地论述了古代中国帝王制造文祸的过程。并且，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帝王制造文祸的原因，以及文祸对古代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作者怀着悲愤的心情，通过翔实的事实，揭露了古代帝王以种种莫须有名义残酷迫害读书人，制造许多冤案

的滔天罪恶。使人们对古代专制帝王的狰狞面目，有进一步的认识。虽然，作者夹写夹议，理论味较浓，但文字通俗，明畅生动，既以情感动人，又不失中肯分析。

古人云：“以史为鉴。”我们写历史、读历史，无非都是想从历代的兴衰祸乱中，取得经验和教训，以为借鉴。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曾经说过：“读史使人明智。”其真谛即在于此。倘若光读史实，而不分析，又如何能“明智”呢？这当然不能独怪我们读者，事实上，许多写史的著作也犯有同样的错误。而《古代帝王与文祸要论》一书，却从某种程度上，跳出了这个误区。该书取材，贯通正史和稗官野史，横跨三千年，使人有一种宏观的视觉效果。特别是其中肯的分析，合情合理，得出了许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令人读之，感慨万端，明白许多人生的道理。

总之，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书，我相信，它的问世，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们的欢迎。

是为序。

邬国勋

96. 12. 7

## 目 录

前言 (鄂国勋) .....	( 1 )
帝王与文人言语之祸 .....	( 1 )
诽谤之祸 .....	( 4 )
轻薄之祸 .....	( 17 )
炫才之祸 .....	( 27 )
帝王与文人作品之祸 .....	( 38 )
史祸 .....	( 39 )
诗祸 .....	( 52 )
字祸 .....	( 69 )
戏曲小说之祸 .....	( 79 )
书祸 .....	( 84 )
帝王与文人政治之祸 .....	( 110 )
疏谏祸 .....	( 114 )
党祸 .....	( 148 )
帝王与文人科场之祸 .....	( 167 )
文字犯忌 .....	( 170 )
舞弊循私 .....	( 177 )
帝王与文化思想之祸 .....	( 184 )
异端 .....	( 185 )
黜儒 .....	( 189 )
排佛 .....	( 192 )
禁道 .....	( 204 )

# 帝王与文人言语之祸

众所周知，言语这东西，是万物之灵的人类所独有，是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我们人类，之所以成其为人类，能够用言语，表达思想和感情，恐怕是其中最富有历史意义的缘故。它和人类的形成相辅相成，是在人类自身生产实践中产生的，又反过来促进人类及其文明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言语无疑是我们人类赖以骄傲的、自豪的东西。

然而，也正是言语这种东西，与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大而言之，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国；小而言之，“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可见，言语的妥当与否，被认为是一个人智德的表现。同时，在儒家学说中，“言忠信”即说话言语上讲信用，被认为是评判一个人道德修养境界的重要标准。同时，它本身也是一个人道德修养境界的组成部份。正因为这样，孔门学说中，特别重视一个人言语的修养。认为，要做好一个社会的人，不懂得如何恰当地言语，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我们翻开《论语》，就可以看到，儒学创始人对一个人如何言语是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的。《论语·季氏》中记载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

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意思是说，陪侍在君子旁边，（言语上）有三种容易犯的过失：当君子没问话，或还未说完你就等不及了，抢先说了，这就犯了“躁”的过失；当君子已经问话，你仍王顾左右，偏偏不说，这就犯了“隐”的过失；当你还未弄清君子脸上的颜色，就信口胡说，这就犯了“瞽”的过失。这话虽然是当时社会道德的反映，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化普遍意义。即使到了现在，也还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指导我们言语恰当与否的准则。事实上，古人所讲的“躁”“隐”“瞽”这三种言语上的错误，在我们现代人的种种场合里，俯拾即是。而造成的影响，也有大有小。正由于言语这东西，自古及今，难于达到十全十美的地步，甚至随时都可能犯上不可饶恕的过失。因此，象孔圣人这种话已说得十分恰当的人，都不得不发出感叹：“言不可不慎也。”汉人刘向，在《说苑》中，记有这样一件轶事。说是孔子到了周都，去太庙右陛观游，看见一个金人，“三缄其口而铭其背。”铭文是这样的：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何残，其祸将然。勿谓莫闻，天妖伺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将成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青青不伐，将寻斧柯。诚不能慎之，祸之根也。口是河伤，祸之门也。

……

这段铭文的大意是说，人们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外求事功，切忌多言多语。否则，无意中冒犯了人，就会引来无穷的祸患。所谓“祸从口出”是也。可见，至少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有“言语之祸”了。不然，为何把刻有如此铭文的金人，放在天子的太庙

中呢？这难道不是对世人，尤其是政治漩涡中的文人士大夫们的一种郑重的警告么？难怪孔子读完这段铭文后，就对弟子们说：“记之，此言虽鄙陋而中事情。”所谓“中事情”，无疑是指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在一个没有文祸的社会里，又怎么会这样出现这样一个“三缄其口”的沉默金人呢？事实上，这样一位危言耸听、屡屡告诫多言者的缄口金人，独独出现在中国的古代，这决不是一种偶然，而带有一种深刻的必然性。

古代的中国，自从进入文明时代后，就确立了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制度。社会的细胞家庭，在结构上，和统御社会的国家政权是同构的。在一个家族里，家（族）长的权力，大到可以干涉每个成员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而国家的权力，对每个臣民的控制和影响，与此完全类似。皇帝就是大家长。他的权力，可以干涉一切。他的意志，是唯一的意志，不容许任何一个人有所冒犯和不满，否则严惩不贷。在这种专制权力的社会里，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得顺着王朝意识，维护皇权思想。而事实上，人们的言行，无不具有政治上的涵义。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有可能被赋予种种政治的内涵。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的言行自然是要慎之又慎了。对此，孔子又发表他的议论，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中庸》）。他认为，国家有道时，有话只管说；国家无道时，千万不要乱讲话。不过，无论如何，话总是少讲为妙。因此，孔子又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这说明，在古代那专制的社会里，言语得祸要比行为得祸容易得多。以致到唐代徐彦伯作《枢机论》时，首论“戒言”。言语确实是文人士大夫们的致祸之门。大多数的帝王，都注重从言论上控制文人士大夫们。在几千年封建社会里，有多少文人士大夫，就因为一句话没讲好，或者犯讳，或者炫才，或者

轻薄，或者诽谤，小小一言之过失，就被那些少恩寡情的寡人们送上断头台，做了怨鬼恨魂。这既是中国文化精英的人才丧失，同时，更是一种长期徘徊在中国文化上空的文化阴影。不慎的言语，简直如同一根宰玩文人士大夫命运的魔棒，闪着吃人的碧绿的幽光，高悬在中国文化的上空。而魔棒的一端，却握在帝王们的手中。它什么时候落到你头上，完全取决于帝王们的某个念头。轻率的起因，却结出了严重的恶果。下面，就从三个方面来叙述。

## 诽谤之祸

何为“诽谤”？《辞源》上讲：“说人坏话”。这个解释显然不那么准确。至少它仅仅局限于文字学的领域。实际上，这个词在中国政治史上，有它特别的含义。一般来说，“诽谤”是指臣民私下对君主、朝政加以议论批评。关键的地方在于“私下”，即议论批评的场合是非正式，或非公开的。大多数情况是话带怨愤，或语含讥刺。身在官场的文人士大夫，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话都不便在朝堂上公开讲，但又有些想法，郁积胸中，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于是只好在茶余饭后，独坐花厅，仰天长叹，直抒胸臆；或二三好友，围聚风月，抚脾长论。说到快处，忘乎所以，口吐真言；或游山水，为景所触，随意评点，不知不觉，珠玑若现，等等。无论何种境遇下，倘语传圣上，弄得寡人心存惭愧，恼羞成怒，不自觉的手挥魔剑，一气斩下。文人士夫的小头，咕咚一声，滚落地上。谤祸成矣。

从中国文祸史上看，谤祸是最初的文祸类型之一。相对于谏诤来说，它主要是文人士夫政治见解的一种带有情感的私下渲泄。它间接地向君主表明，在政治见解上，已具异心，已萌异念。况

且，私下散布，弄得人心不安，议论汹汹，造成君主舆论上的被动。这自然是君主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历代君主，不论明智与昏庸，都努力采取措施，对诽谤者严加惩治，毫不留情。

首先，从法律制度上看。不但专门有诽谤律，而且，比附定罪都比较严重，非同小可。一般地讲，先秦时期，由于专制主义尚处于早期，对言论控制相对宽松。原始的军事民主制的遗风，还有点影响。特别到春秋战国，“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各路诸侯广求人才，不拘一格，礼贤下士。不但不对言论加以控制，甚至以言举人。对随便言语的人，根本不敢得罪，又哪里敢去治罪。因此，孟子当面斥责梁惠王：“率兽食人”，咄咄警告齐宣王：“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时，两位赫赫的王侯，只有面露饥色，听得入神的份了。若是到了秦以后，无论哪一朝代，敢说这种话的人，不死才怪。然而，在先秦时代，这种人不但可以活得好好的，而且还很受尊敬。终先秦时代，基本上没有谤祸。大多数君主，都有主动求谤的行为。诽谤在先秦时代，并没有赋予反面的性质。基本上被认为是正常的批评方式。看看下面的几条材料就知道了。

“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

——《管子·植公问》

“尧有建善之旌，舜有诽谤之木。”

——《尸子》

同样的记载，还见于《邓析子》和《吕氏春秋》等书。说明上古的君主们相当明智。他们对人们私下的政治意见相当重视。因此，采取措施，加以宣泄和引导。同时，也使自己耳目清楚，心里明白，不至于做个糊涂蛋。



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当属郑国的子产。子产虽不是帝王，但他是郑国的宰相，是掌权者。他主持郑国政治后，实行改革，“立谤政”。即允许人们私下议论朝政。当改革之初，人们不适应突然的变动，都私下作歌咒他，很难听。说：“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左传·襄公三十年》）。后来，干脆以乡校为中心，人们都聚集在那里，畅所欲言，大肆批评朝政。子产的朋友然明，瞧着心里着急，便建议子产“毁乡校”。子产不同意，说：

“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的这番话，说得真是太堂堂正正了，简直可以说是代表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健康面。短短几句话，就把后代几千年以来，君主们所弄不懂的“立谤”的所有理由说得明明白白。由于子产的明智，从人们的谤语中，知道政治的利弊，及时纠正。终于使改革获得成功。

唯一使先秦时代，在“立谤”上蒙羞的是周厉王。《国语·周语》记载，周厉王暴虐无常，国人都私下批评他。大臣邵公就告诉周厉王：老百姓已经很难忍受你了。周厉王听了，不由大怒。便雇佣了卫巫，混在老百姓中间，秘密监视老百姓的动静。凡是私下批评朝政的人，卫巫便摸清情况，报告上去。周厉王便立即斩杀。这一来，大家都不敢讲话了。走在路上碰见了，连招呼都不敢打，只能以目示意。愤怒都郁积在心中。周厉王看到再也没人